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3.03.010

# 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无罪辩护

郭运帷

(吉林大学 法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协商式司法模式”之称,在认罪认罚案件的司法实践中仍有辩护律师从事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与证据规则适用等层面作无罪辩护。事实认定的准确性、罪刑法定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构成了此类无罪辩护的正当性基础,认罪认罚制度的包容性、辩护人的有限独立地位及职业伦理、防范冤假错案的需求以及形成多元辩护合力的需要也为其提供了合理空间。律师在此类案件中作无罪辩护时应注重辩护意见的有效性,确保辩护策略形成的协同性。公检法等国家机关应当尊重和保障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律师无罪辩护。

**关键词:** 认罪认罚; 无罪辩护; 辩护冲突; 有效辩护; 辩护协调

**中图分类号:** D92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3)03-0084-08

**引用格式:** 郭运帷. 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无罪辩护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8(3): 84-91.

## On the Not Guilty Defense in the Case of Pleading Guilty and Accepting Punishment

GUO Yunwei

(School of Law,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leniency system for guilty plea and punishment is known as the “consultative judicial model”. However,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guilty plea and punishment cases, there are still defense lawyers who defend their innocence from the aspects of fact determination, law application and evidence rules application. The accuracy of fact determination,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for a crime and the principle of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constitute the legitimate basis of such innocence defense. The inclusiveness of the system of confession and punishment, the limited independent status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of the defender, the need to prevent the unjust, false and wrong cases, and the need to form a multiple defense force also provide a reasonable space for it. Lawy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validity of defense opinions and ensure the synergy of defense strategies when defending innocence in such cases. Public security organs, procuratorial organs, people's courts and other state organs should respect and guarantee the innocence of lawyers in cases of confession and punishment.

**Keywords:** pleading guilty and accepting punishment; not guilty defense; conflict of defense; effective defense; defense coordination

收稿日期: 2023-03-02

作者简介: 郭运帷(1997—), 男, 河北保定人, 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证据法。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种“协商性的公力合作模式”<sup>[1]</sup>催生了律师辩护的新样态，使其呈现出由“激烈对抗”向“温和合作”的转变。尽管如此，司法实践中仍有一些律师在其委托人已经认罪认罚的情况下当庭提出无罪辩护意见，将案件重新拉回了诉讼对抗的轨道。

上述做法引发了争议，反对者认为认罪认罚案件应当采用协商式而非对抗式辩护模式<sup>[2]</sup>，其目的在于通过量刑协商和量刑辩护最大程度地为被告人争取从宽处罚之回报<sup>[3]</sup>；支持者主张辩护律师可以就案件事实的罪与非罪提出意见<sup>[4]</sup>，可以作出无罪辩护<sup>[5]</sup>。略显遗憾的是，既往研究主要关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协商式辩护形态，而对该制度实践中出现的对抗式辩护则缺乏系统关注。因此，有必要探讨此类辩护方式的容许性，并思考如何正确对待这种辩护冲突。

## 一、认罪认罚案件无罪辩护的容许性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预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放弃诉讼对抗并转向控辩合作、司法机关采用简化的程序对案件进行快速处理的理想模型，却对辩护人能否提出无罪辩护意见语焉不详。笔者认为，应当容许辩护律师为认罪认罚被追诉人作无罪辩护。

### （一）事实基础：认罪认罚与事实认定

准确的事实认定是法院裁判的前提，事实认定的准确性要求决定了辩护律师可以从事实层面提出无罪辩护意见。

首先，被追诉人的供述不是法官作出判决的唯一事实依据。对于认罪认罚案件，我们主要关注的事实是犯罪要件事实，而被追诉人的自愿认罪在本质上只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该证据及其证据事实本身并不等同于法院司法认定的事实，有时甚至与检察机关的指控事实也存在差异，只有供述事实、指控事实与司法认定事实构成了“逻辑统一的闭环”，认罪认罚的事实认定环节才告完成<sup>[4]</sup>。被追诉人自愿供述的案件事实可以被推翻和更正，这种推翻和更正建基于控

辩双方举证、质证和法官认证的程序，其中蕴含着辩护律师提出新的证据以重构案件事实或者质疑原有证据真实性，以使案件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可能。

其次，证据裁判原则禁止专门机关违背证据规则进行事实认定。无论是认罪认罚案件还是非认罪认罚案件，事实认定都必须符合证据规则，否则被追诉人及其辩护律师可以对有关证据以及据此认定的案件事实发起挑战，动摇有罪判决的证据根基。依法应予以排除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根据，不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明体系的证据之证明力不甚完备，这些都会不同程度地阻却有罪判决，也是辩护律师从证据规则适用层面进行无罪辩护的正当性之所在。

最后，无罪辩护是实质真实原则的程序性保障措施。与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下的形式真实相异，我国公安司法机关处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坚持实质真实原则，该原则可在控辩双方的有罪指控与无罪辩护的证明活动中得以显现。既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没有放弃追求案件的实质真实，那便需要防止被追诉人错误认罪对法院事实认定的误导。一方面，律师的无罪辩护有助于指出公诉方指控体系的缺漏，削弱检察机关单方建构的事实对法官心证的影响，避免被追诉人的认罪认罚给法官定罪裁判施加过多的权重；另一方面，辩护律师也能够通过提出证据的方式“去伪存真”，积极协助法院发现新的事实，使裁判者不断接近可能的真相。

### （二）法律基础：保障认罪认罚合法性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求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具有合法性，不仅被追诉人如实供述的事项须被刑事实体法评价为犯罪行为，而且认罪认罚案件的办理过程也要符合刑事程序法，否则人民法院不能作出有罪判决。

认罪认罚案件无罪辩护的实体法基础在于罪刑法定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3条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只有对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才能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否则不得定罪处刑。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在定罪、罪名与罪数的问题上无差别地“确立了较为严格的法定主义的处理方式”<sup>[6]</sup>，而没有为控辩协商留下任何合法空间，这三项内容不受控辩双方意思

表示的拘束。故在案件事实认定之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在实体上构罪与否完全取决于刑法评价,被追诉人认罪与否均不应对应法院的定罪裁判产生决定性影响,诉讼各方都有权利就涉案行为的法律定性发表意见,因此以被追诉人认罪为由质疑律师无罪辩护之正当性的观点不能成立。正是因为我国奉行罪刑法定原则,律师才可以独立从刑事实体法的视角为其委托人进行无罪辩护。

无罪推定原则构成了认罪认罚案件无罪辩护的程序法基础。刑事诉讼中律师进行无罪辩护的权利之源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无罪辩护权。《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蕴含了无罪推定精神。无罪推定原则意味着在未被依法证明有罪之前,任何人都被推定为法律上的无罪之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据此提出自己不构成犯罪的辩解意见,公安司法机关有义务予以尊重,因此律师为法律上的无罪者作无罪辩护自然不应受到非议。被追诉人认罪后依然受无罪推定原则的保护,律师无罪辩护的程序法基础不因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而消灭。一方面,无罪推定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从其效力范围来看,相关法律规范中不存在认罪认罚案件的但书条款,并未呈现出认罪认罚案件与非认罪认罚案件的分野,故无罪推定不因认罪认罚而产生特殊性;另一方面,即使被追诉人认罪认罚,我国检察机关指控犯罪以及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时也需要确信案件已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最高程度,这从侧面说明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始终享有无罪推定原则的“诉讼特权”。

### (三) 制度原理: 协商性与对抗性共存

认罪认罚制度具有包容性,即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协商性与对抗性是共存关系,这一制度原理容许律师为认罪认罚被追诉人作出无罪辩护。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只是以控辩合作与协商为主基调,相对弱化了控辩对抗与冲突的因素,没有且不可能消除程序中的对抗性,协商性司法程序既包含大量的协商性成分,也可以包括部分对抗性因素。不少学者或多或少将协商和对抗置于互斥状态,但这种把协商性与认罪认罚对等起来的观点只能代表协商性司法的典型模型,不能涵盖其全部样态。况且,检察机关的诉讼目标是成

功实现指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却不可能以追诉犯罪为己任,这种核心利益与诉讼职能方面的差异意味着控辩双方存在天然的对立<sup>[2]</sup>。此外,认罪认罚“必须具有基本的事实根据,并符合法律的外在限制”<sup>[5]</sup>,一旦案件的事实基础存疑或者认罪认罚的法律符合性欠缺,任何形式的诉讼协商都将失去正当性根基,辩护律师若对特定认罪认罚案件的事实依据和法律边界持有异议,即可以提出无罪辩护意见的方式在被追诉人之外为诉讼进程注入对抗性因子,在质疑、争论、对抗的严格证明和法律论证过程中寻求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突破口。

从协商性司法的诞生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应当建立在正当程序比较完备、竞技性与对抗性充分发展的对抗制诉讼模式之基础上<sup>[7]</sup>。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对抗机制尚未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就已如火如荼地展开,而且“认罪认罚制度设计过于追求效率价值,更多的是站在公安司法机关提高办案效率的立场,这很容易突破正当法律程序的底线”<sup>[8]</sup>。在认罪认罚从宽这一新型诉讼模式中为传统的无罪辩护形态保留一定生存空间,不失为弥补程序正义不足之良策。对抗性的律师无罪辩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非理性。既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异化为压制型司法的较大可能,那么“协商性”也不应成为该制度“金科玉律”式的属性,此时需要律师提供强大的辩护力量来帮助被追诉人摆脱控辩非平衡的不利境地,维持法官裁判的中立性,即律师无罪辩护需要被容许。

认罪认罚的制度原理没有剥夺辩护律师对抗性辩护的空间。虽然被追诉人在认罪认罚之后一般会得到法院根据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作出的有罪判决,但是我们不应从诉讼结局的角度理解认罪认罚意思表示的法效果。认罪认罚至多表明被追诉人的自我辩护权受限,其只是放弃了无罪辩护权的自行行使而非无罪辩护权本身。“认罪合意”<sup>[9]</sup>是一种形式性合意,仅在结果意义上表征主体认知的一致性,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并承认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检察机关均认同犯罪事实的存在,不过涉案行为是否的确具有刑事违法性以及行为人应否课以有责性评价的问题,无法通过控辩双方带



有“讨价还价”色彩的合意程序加以解决，既然控辩双方无实质商议，那便仍可对抗争辩。

#### （四）职业伦理：辩护人有限独立地位

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有限独立地位和以忠诚义务、公益义务为主要内容的职业伦理是辩护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开展无罪辩护的重要正当性渊源。

当前我国采取了“有限的独立辩护人理论”，虽然对辩护律师的独立地位施加了忠诚义务的外在限制，要求其在进行辩护时维护委托人利益并尽量尊重委托人意愿，但是依然承认律师“不仅仅是相对于公诉人、相对于人民法院，也是相对于被追诉人的独立”<sup>[10]</sup>，其意见“不仅独立于控诉方、裁判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其委托人的意志”<sup>[11]</sup>。《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了辩护人职责，该条授权辩护人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的材料和意见，体现出维护被追诉人利益的鲜明导向，暗含了对辩护律师为维护认罪认罚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而独立作无罪辩护的容许。《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2条规定，律师应当“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这在维护委托人利益之外确立了辩护律师的公益义务。当律师认为其委托人的认罪认罚不具有事实基础或法律依据、法院判决被告人有罪将违背社会公平正义时，进行有理据的无罪辩护才是符合职业伦理的选择。《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5条更是直接点明了“独立履行辩护职责”以及“不得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提出不利于当事人的辩护意见”，也就是说，律师可以违背当事人意愿而独立提出有利于委托人的辩护意见。忠诚义务要求律师既要尊重委托人的意志，又要维护委托人的利益，但无论是《刑事诉讼法》第37条还是《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5条都表明“维护利益”在忠诚义务内容体系中的优先性，对于可能得到无罪处理的认罪认罚案件而言，无罪辩护追求的诉讼结果显然对被追诉人更加有利。

#### （五）现实原因：防范与纠正冤假错案

某些现实性和制度性因素的存在加剧了认罪认罚案件司法误判的风险。首先，很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是专业的法律人士，没有精深的法律素养和高超的辩护技艺。作为案件的亲历者，被追

诉人虽然在事实层面可能具有比较准确的认识，但大都缺乏对相关事实进行法律定性与分析的能力。在面临国家刑事追诉时，其在心理上承受高度压力，且“被追诉人并不享有阅卷权、事先并不知悉控方证据数量、质量和体系”<sup>[12]</sup>，这就可能导致被追诉人把无罪事实或者可作无罪处理的情节轻微事实误认为构成犯罪，增加了被法院错误定罪的风险。其次，检察机关是刑事审前程序中的主导者，实践中其强力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能造成检察官急于进行量刑协商而忽视对罪与非罪问题的审查，运用权力和资源优势向被追诉人施压，迫使后者尽早认罪认罚。此时，所谓“量刑减让”将异化为“量刑强制”，为冤假错案的发生留下了隐患。最后，认罪认罚程序没有采取精密化设计，使得刑事程序发掘真实之功能大幅减弱，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因被追诉人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相互配合”共同打击犯罪的关联更加紧密；同时，认罪认罚意味着控辩双方在定罪这一先决问题上不存在根本分歧，控审“相互制约”的必要性也随之下降，因而裁判结果的真实准确性难以保障。

辩护律师就认罪认罚案件提出无罪辩护意见，有利于保障刑事被追诉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基本权利，防范与纠正可能出现的冤假错案，维护刑事诉讼中的实质正义。有效的律师参与本身不仅可以增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能力，而且对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形成了制约，可防止司法机关滥用刑罚权。律师虽然属于辩护方，但是能够就刑事案件之整体发挥把关作用<sup>[13]</sup>。当其发现己方当事人违心作出了事实基础存疑的认罪认罚或者案件可以适用某项出罪规范，就可通过无罪辩护的方式在审前程序和审判程序中提醒相应的程序控制者，防止事关定罪裁判的关键性细节“被集体选择忽视”<sup>[14]</sup>，纠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人罪化倾向。

#### （六）辩护效果：形成多元化辩护合力

辩方内部的具体观点可以多元化，被追诉人及其辩护律师也可以从多个角度争取诉讼利益，作为诉讼策略而存在的无罪辩护反而有助于辩方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形成多元辩护合力。

其一，无论是辩护律师说服委托人认罪认罚而

自己提出无罪辩护意见,还是律师本人既进行无罪辩护又进行量刑辩护,上述辩护方式都具有利益均沾的优势。其二,律师的无罪辩护意见为裁判者“兼听则明”创造了条件。一方面,法官能够从认罪认罚情节中看到被追诉人不抗拒甚至积极主动配合专门机关办案的良好态度;另一方面,法官也会因律师提出的动摇认罪认罚之根基的无罪辩护意见而慎重斟酌有罪认定的妥适性。其三,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辩护观点矛盾会造成辩护效果的相互抵消。在一些案件中无罪辩护非但没有对辩方诉讼结果造成消极影响,反而为被追诉人争得了更加轻缓的量刑。(参见(2020)鄂2801刑初431号刑事判决书、(2021)皖0123刑初108号刑事判决书)其四,律师无罪辩护可被辩方用作平衡控审两方力量以实现其辩护目标的一种程序手段。刑诉法解释规定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应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的程序性和实体性权利在该程序中能够得到法院更加周延细致的保障,所以辩护律师对审判程序的这种“单方变更权”实则为辩方强化其辩护效果提供了契机。此外,庭审过程中律师可借助无罪辩护意见向法官心证施加影响,最终达到刑罚轻缓化的实质目的。其五,无罪辩护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还具有交涉筹码的属性,这同样有助于辩方收获良好的辩护效果。无罪辩护意见一旦为法院所认可,就会导致认罪认罚合意的失效以及检察机关追诉活动的失败,进而给主办检察官带来考核压力。这实际上是在以定罪裁判的不确定性为筹码“迫使”控诉方接受更轻的量刑方案。

## 二、认罪认罚案件无罪辩护的质效保障

### (一) 注重无罪辩护意见的有效性

我国无罪判决率极低,这意味着无罪辩护意见不易被法院采纳,律师为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作无罪辩护更有可能引起专门机关的本能抵触,所以辩护律师决定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进行无罪辩护时必须审慎权衡,并且除了在一般意义上坚持有效辩护理念之外,还要进一步考虑如何尽量使自己提出的辩护意见实际有效。

首先,有效辩护在内容上要求无罪辩护意见具有事实和法律基础<sup>[15]</sup>,需要律师在进行无罪辩护时阐释具体且明确的理由。在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已经向公安司法机关主动表达了认罪意愿之后,律师只有在辩护意见中详细附具其委托人不构成犯罪的理由,才有可能阻断被追诉人有罪供述对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内心确信的影响。

“一语带过”式的过于简单或没有实质价值的无罪辩护不仅会浪费司法资源,而且很可能引发控审两方对辩方的负面评价,最终导致律师既难以说服法官作出无罪判决,又无法为被告人争取最优的从宽处理结果。

其次,律师需要针对认罪认罚案件的特点采取策略性辩护方式。律师如果认为被追诉人可能被判无罪,就可以把无罪辩护作为主攻方向,并综合罪轻辩护、量刑辩护、程序性辩护等多种方式以兼顾被追诉人多层次、多种类的诉讼利益。辩护律师以最大程度维护委托人利益作为第一任务。根据《指导意见》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公安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一般应当体现法律规定和政策精神予以从宽处理,即“实体从宽处罚、程序从简处理”也是一种诉讼利益,所以律师在追求无罪判决时不能忽视认罪认罚的从宽利益以及量刑方面的其他利益。附带量刑意见的无罪辩护的确有自相矛盾之嫌,但其无不体现着形成多元辩护合力的实用性,在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等裁判方式尚未从我国刑事审判中被全面剔除之前,这种逻辑上的缺陷无可厚非。

最后,律师应当把握审前程序中的辩护机会。《刑事诉讼法》第201条规定,“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使法庭审理过程呈现出一定的“形式化确认”特点<sup>[16]</sup>。从某种意义来看,检察官分享了部分司法裁判权,审前控辩协商结果将极大地影响法院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因此律师进行无罪辩护时就要把主导审查起诉阶段的检察官作为重点说服对象,甚至审前辩护才是认罪认罚案件辩护工作的重心<sup>[17]</sup>。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应当向办案机关了解被追诉人所涉罪名和案件具体情况,主动及时地同犯罪嫌疑人会见,一旦发现能够证明委托人无罪、罪轻的各项证据或者案件存在《刑事诉讼法》第16条规定的情形,要适时向公安机关提出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或案件应被撤销等辩护意见。对于认罪认罚事项,律师应当做好释法说理工作,确保被



追诉人及早了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规定，最大程度避免委托人在侦查阶段非自愿、非理智、非真实认罪，以免为后续诉讼阶段的辩护工作带来困难。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切不可沦为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的“见证人”。控辩双方虽然不能就定罪问题展开协商，但是律师依然可以通过提出法律意见、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提出不起诉或撤回起诉意见等方式，为其委托人争取检察机关的无罪化处理。

## （二）确保辩护策略形成的协同性

首先，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无罪辩护至多是一种有限度的独立辩护，律师不宜以完全独立于被追诉人的态度开展辩护工作。公益义务容许辩护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为追求事实真相和维护公平正义作无罪辩护，而居于律师职业伦理体系中心的忠诚义务要求律师进行辩护活动时尊重委托人的意志与利益。在认罪认罚程序中，被追诉人有权自主决定的事项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因此在被告人对案件事实的供述出于自愿的情况下，辩护人必须尊重其态度，不宜与其在事实认定方面的明确意愿相悖或在辩护方向和策略方面与之发生冲突，除非检察机关指控的案件事实存在影响定罪的明显错误；当被追诉人明确反对辩护律师从事事实认定角度提出的无罪辩护意见时，律师也应当及时调整辩护思路，不应固执己见。由于被追诉人的认罪认罚不能对法律适用和证据规则适用等事项发挥实质效力，所以即使辩护律师难以就此与其委托人协商一致，也可以独立发表辩护意见。

其次，拟作无罪辩护的律师应对认罪认罚被追诉人尽到告知、沟通与协商义务，以形成明确的诉讼角色分工和辩护策略。有限独立辩护之有限性体现在无罪辩护意见形成前，律师要保障委托人的知情权，及时把自己的辩护思路告知被追诉人，在和被追诉人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征求、吸纳其对无罪辩护的意见和建议，尽量达成统一的辩护思路，即律师应当进行“协同性辩护”<sup>[18]</sup>。没有经过充分沟通即提出的无罪辩护意见会破坏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消解辩方内部的辩护合力。当案件确实存在被判无罪的较大可能性时，辩护律师既不能为了“迎合讨好”司法机

关而诱使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也不可过分固执于自己对案件性质的判定而强迫委托人否认控罪，其应当及时充分地与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协商和沟通，尽力说服当事人接受自己给出的辩护方案，即在维护被追诉人诉讼利益、尊重其自主意愿的前提下商讨形成“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辩护策略。如果辩护律师主动协商但被追诉人不置可否，那么律师只要勤勉尽责地做到及时准确地向被追诉人核实有关证据、说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规定以及认罪认罚的性质和后果、指导被追诉人与其讨论形成辩护方案，即可被视为获得了委托人就无罪辩护事宜的明示或默示授权，有限独立辩护理论对辩方协同性的底线要求也得以满足。

最后，辩护律师如果确实无法就无罪辩护事项与认罪认罚被追诉人达成一致，那么就应当主动告知当事人有权解除委托，不宜径行退出案件代理。辩护律师随意解除委托代理关系会陷被追诉人于没有律师帮助的不利境地，有违辩方内部关系的协同性，不利于辩护进程的推进，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因此，如果被追诉人明确反对律师作无罪辩护，即便经过了双方对辩护方案的深入商讨，律师也无法说服被追诉人接受其无罪辩护观点，那么出于对委托人意志和利益的尊重，律师有必要主动告知被追诉人有权拒绝其继续辩护并可另行委托其他律师办理本案，并阐明当前诉讼阶段律师退出辩护后的相关法律风险，由被追诉人依其意愿决定是否解除委托代理关系。

## （三）尊重和保障律师的无罪辩护

首先，刑事诉讼专门机关应当树立尊重律师无罪辩护的观念，坚持审慎处理原则和尊重辩护意见多元性原则。第一，我国刑事诉讼法针对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确立了审慎处理原则。辩护律师一旦提出无罪辩护意见，人民法院就必须适用权利保障措施更为周延的普通程序审理有关案件，该规定背后蕴含了慎重对待律师无罪辩护的精神，这种审慎处理原则应当在认罪认罚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得到体现。附带量刑意见的无罪辩护天然带有辩护效果“自行抵消”的特征，但其很多时候是律师应对法院极低的无罪判决率的一种无奈选择，故而司法机关有必要对辩方辩护效

果的自行抵消施以某种“补偿”,即司法容忍与审慎处理。第二,实践中司法机关已经形成了对待认罪认罚案件辩护冲突的尊重意见多元性原则,即法院没有显现出以委托人意见为主或者以辩护人意见为主的倾向,反而会对各方提出的具体主张分别予以回应,可见“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辩护人作无罪辩护”这类辩护冲突之中不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公检法三机关必须同等重视辩方内部多元复杂的辩护意见。第三,法院不得仅因辩护人作无罪辩护而否定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效力,不得据此拒绝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非法剥夺被追诉人获得从宽处罚的诉讼利益;检察机关也不得以辩护律师对其有罪指控提出异议为由,通过单方面加重量刑建议、撤销认罪认罚具结书或者提起抗诉等方式向被追诉人施加压力。

其次,有关国家机关应就认罪认罚案件无罪辩护问题确立统一规范。第一,针对认罪认罚案件的刑事辩护制度还不够细致的现状,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总结检察工作和审判工作经验,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或者联合制定司法解释的方式为律师无罪辩护提供制度保障。第二,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等可以探索无效辩护制度的具体标准。无效辩护制度是有效辩护原则发挥实效的制度保证。一方面,若司法机关对辩护律师的无罪辩护意见持有排斥、反感等倾向,甚至因此而影响了其对被告人的罪刑判断,则容易出现公权力干涉下的无效辩护,损害被追诉人获得律师有效辩护的权利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公正性;另一方面,律师不恰当地为认罪认罚被追诉人作无罪辩护确有可能招致司法机关的反感和不利处理,因此,作为规制律师辩护行为的无效辩护制度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

再次,刑事诉讼专门机关应当强化意见听取与理由说明。第一,检察机关在开展量刑协商前必须主动听取辩护律师对被追诉人是否构成犯罪的意见,对于律师在审前阶段作无罪辩护的案件,检察机关不能急于促成被追诉人认罪认罚;检察机关在审查相关无罪辩护意见之后决定不予采纳的,应当书面说明不予采纳律师意见、被追诉人构成犯罪的理由,并将相关材料附卷供法院审查。第二,如果辩护律师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提出了具

体的无罪辩护意见,那么法院就不应仅以“事实认定清楚”“辩护意见与事实、法律不符”等表述敷衍塞责,至少要以在案证据为基础详细说明不予支持律师辩护意见的理由,案情复杂时还需在裁判文书中展现法官的推理论证过程。第三,实践中很多被追诉人在辩护律师介入案件前就已经认罪甚至认罚<sup>[15]</sup>,对于被追诉人认罪认罚时缺少律师参与的案件,公安司法机关应当在辩护律师介入案件后及时补充听取和审查其对本案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的意见。

最后,人民法院审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实质审查律师的无罪辩护意见。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立的控辩协商模式没有法官参与的空间,因而一旦法庭审判实质性式微,就将产生刑事程序失控的危险。第一,法院对待证事实和法律适用的审查认定责任不能因被追诉人认罪而减弱。法官必须审慎认真地倾听、调查、回应辩护律师提出的无罪辩护意见,在单向度的自行审查之外增强与控辩两方的庭审交互性,同时要注意区分律师无罪辩护的理由,有针对性地分别从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证据规则适用角度审查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第二,法院不宜在庭审过程中主动询问被告人是否同意其辩护人的无罪辩护意见。只要被告人自己并未当庭翻供、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或者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不再自愿接受处罚,就应当继续承认其认罪认罚的从宽利益。一方面,法院在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后径行追问被告人对此同意与否的做法无疑会将放弃行使部分诉讼权利、呈现积极合作姿态以求国家司法机关宽大处理的被追诉人重新置于进退维谷的不利境地,甚至导致律师的辩护工作前功尽弃。如果被告人反对其辩护律师的无罪意见,那么不仅律师的辩护效果将被极大削弱,而且法院的询问行为也有故意制造辩方内部矛盾和“法官公诉人化”的嫌疑;特别是在律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进行无罪辩护的情况下,如果被告人同意其辩护律师的无罪意见,那么法院很有可能认定被告人反悔进而不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告人也会因此失去量刑减让的机会。另一方面,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询问也是法院逃避案件审查责任的表现。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良善发展离不开刑事辩护制度的贯彻落实。虽然无罪辩护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多处于“备而不用”的状态，但其始终是守护刑事案件底线正义的必要手段。辩护律师有权相对独立地为认罪认罚被追诉人提出无罪辩护意见，这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监督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合法合理地进行刑事诉讼，以确保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之正当性的落实。

#### 参考文献：

- [1] 陈瑞华. 刑事程序的法理: 下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634.
- [2] 李 辞.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辩护形态[J]. 理论月刊, 2021(10): 142-152.
- [3] 孔令勇. 认罪认罚辩护的理论反思: 基于刑事速裁案件辩护经验的分析[J]. 刑事法评论, 2017, 40(1): 254-271.
- [4] 齐昌聪. 论认罪认罚的事实认定进路[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21, 39(3): 131-141.
- [5] 陈瑞华. 论协商性的程序正义[J]. 比较法研究, 2021(1): 1-20.
- [6] 陈瑞华. 论量刑协商的性质和效力[J]. 中外法学, 2020, 32(5): 1126-1149.
- [7] 曾 亚.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控辩平衡问题研究[J].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8(3): 37-49.
- [8] 陈卫东, 安娜.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律师的地位与作用: 以三个诉讼阶段为研究视角[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0(6): 81.
- [9] 贾志强. 论“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有效辩护: 以诉讼合意为视角[J]. 政法论坛, 2018, 36(2): 171-184.
- [10] 王敏远, 胡 铭, 陶加培. 我国近年来刑事辩护制度实施报告[J]. 法律适用, 2022(1): 43.
- [11] 易延友. 刑事诉讼法: 规则 原理 应用[M]. 5版.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9: 155.
- [12] 韩 旭. 辩护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有效参与[J]. 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2016(6): 67.
- [13] 王敏远, 顾永忠, 孙长永. 刑事诉讼法三人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刑事辩护[J]. 中国法律评论, 2020(1): 1-21.
- [14] 王中义, 甘权仕. 认罪认罚案件中法律帮助权实质化问题研究[J]. 法律适用, 2018(3): 70-75.
- [15] 闫召华. 辩护冲突中的意见独立原则: 以认罪认罚案件为中心[J]. 法学家, 2020(5): 133-147, 194-195.
- [16] 李奋飞. 论“交涉性辩护”: 以认罪认罚从宽作为切入镜像[J]. 法学论坛, 2019, 34(4): 31-41.
- [17] 熊秋红. “两种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有效辩护[J]. 法律适用, 2018(3): 56-62.
- [18] 陈瑞华. 刑事辩护的理念[M]. 2版.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21: 188-189.

责任编辑：徐海燕